

朱自振 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

（方志茶叶资料汇编）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

(方志茶叶资料汇编)

朱自振 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

朱自振 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江苏农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15/16) 字数274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册

ISBN 7—81023—445—5

Z·25

定价: 5.50元

序

本辑是编者二十多年前的一部旧稿。可能有读者会问：那末为什么到今天才付出版呢？这是应作解释的。因此，在本书开头，我就把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作为序来先讲一下。

1962年春，在我和陈祖槃先生编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的过程中（“上编”指搜自经史子集和笔记、杂考中的茶叶资料，下编为方志资料），我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当时的主任著名农史专家万国鼎找到我，要我以江苏常州府地方志中的茶叶资料，按不同方案，先编几个样子，以便最后选定一个下编资料的统一编辑体例。本辑现在这样的取舍标准，就是万国鼎先生亲自决定的。在编辑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以前，我室便已由中华书局、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稻、麦、棉等多种资料专辑；但均只是出了上编。方志资料收编的原则确定以后，万国鼎先生希望茶叶资料，能成为我室第一部上下编一起出版的专辑，并要我抽出来专门编辑下编资料。结果，在抄写人员的配合下，于是年年底，我差不多和陈祖槃先生在上编资料完工的同时，一起编好了这部茶的下编资料。

但是，命途多舛，这部资料编好以后，正值社会上几个“念念不忘”也达到高潮之时。万国鼎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介书生，对编书也会有“政治”风险，反应不敏感。我室其他有关同志，可能出于怕我们犯政治错误的谨慎，要我们先不要把稿子送交出版，“把书中凡与封资修有关的每句话、每个字，都一律剔除”。古代资料，与修正主义不搭界，资本主义的内容也少，我们就在封建主义上动脑筋。把凡是摘自《神异

记》、《搜神志》等神怪志一类著作中的资料，首先砍去。后来，又把卢仝《茶歌》“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等提及神、仙、鬼、怪的字眼，以及贡茶、以茶为聘、以茶作祭等内容，也通通删除。到这种程度，把关的同志还犹不放心，又指示我们再寄外单位审阅。这样，一拖再拖，终于拖到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林彪、江青“大革文化命”，一革又耽搁了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风驱寒，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热浪的激奋下，我迺与农业出版社农经编辑室朱洪涛先生联系茶史资料的出版，蒙允可以考虑，我就随即捧着这部资料北上首都。到京后，朱洪涛先生可能考虑这部资料是否出版？还要听听茶界前辈吴觉农先生的意见，就把我带到吴先生家作了引见。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聆听吴老的教诲。在场的还有上海茶叶界前辈钱梁和陈君鹏先生。当我汇报到《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分上、下两编，下编为方志资料时，吴老提出：“上编你们（指农业出版社和我）可以出，下编的方志资料，我自费搜集过，我要出”。对于吴老这一意见，我当时认为，他是领导我国茶业复兴并在茶业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他自己出资搜集方志资料，精神难能可贵，而我是利用我们室收藏的现成资料，所以未加犹豫地接口回答：“如吴老要出，我现在就出，并且还可以把我编的方志资料留下供吴老参考”。这样，1981年，农业出版社就把我和陈祖槩先生编的茶叶资料专辑上编，以《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的名义，作了单独出版。

现在，吴觉农先生的《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终于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在久盼之余，我也想到了束之高搁的我编的方志茶叶资料，就询问农业出版社对这二部稿子都审阅过的穆祥桐先生，问他我编的东西还有无可取之处？穆先生很肯

定地说：“二稿重复的部分固然不少，但也有很多你有他无的内容，如经费有着，把它出版出来，可以起到互相补正的作用”。他的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我室主任叶依能先生的支持。为使我室过去的劳动成果不致埋没并能尽快发挥它们的社会效用，叶依能同志同意我用部分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基金把这部资料印出来。

在将旧稿找出付印之前，我对原稿重作校注、标点时，还发现有不少遗漏，于是，我就委请中国茶叶博物馆代为增补。因此，这本资料虽说是旧稿，但经过重新加工和增补，现在也可以说又是新作，是中国茶叶博物馆增补过的新作了。

看完了上面这些情况，大家也就弄清了原来所不解的这些疑点：为什么六十年代初编的一部稿子，要在二、三十年以后分二次出版？为什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的其他作物历史资料都采用上、下编形式，而唯独茶叶资料是用“选辑”和“续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是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续辑又是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光如流，这部书稿从编到最后出版，一隔就近三十年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天道弓曲，关心和过问过本书出版的万国鼎、吴觉农先生，也已先后谢世。现在这部小书在有关各方的大力协助下，终于付印了，在深情感谢各方帮助、支持的同时，我也谨以此书纪念万国鼎和吴觉农这二位学界巨人！

朱自振

1990年12月10日于杭州

一 凡 例

1. 本辑资料均选摘自方志。

2. 方志中凡引录史籍、笔记、杂考、类书、字书等《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所收或应收的内容，本辑一般都删不重复。

3. 本辑所收各资料前的书名或标题，也即各该资料的出处或来源。由于一地前后志书不止一部，为区别和供读者进一步查考，本书在各志和标题之后，凡能查出编纂人和成书年代的，一律附注清楚。

4. 本辑内容的排列，以地域和各志撰刊的年代为经纬。由于我国方志中以清代编修的方志为最多，所以，在地域的编排上，基本采从清一统志的体例（唯行省由北渐南的序次，按本资料搜抄时的行政区划排列）；在一地，则按撰刊的先后为序。

5. 各府各县，一般前后都有几部方志，每部方志内容，后志抄前志，常多雷同。为避免重复，本辑收录的内容，均以首见和前一部志书的内容为基准；后志和前志所载内容相同者不录，相异和新增内容才作收录。下面以陕西汉阴县志的茶叶资料的选辑为例：

现存方志资料实际情况：

本书选编的资料情况：

万历48年《汉阴县志》

万历48年《汉阴县志》

〔物产〕 “货则茶”。

〔物产〕 货则茶。

崇祯15年《汉阴县志》

〔物产〕 “货则茶”。

康熙26年《汉阴县志》

〔物产〕 “货则茶”。

乾隆40年《汉阴县志》

〔物产〕“货则茶”。

嘉庆23年《汉阴厅志》

嘉庆23年《汉阴厅志》

〔物产〕 方物自隋以前 〔物产〕 方物自隋以前
不著于史，《唐书·地理志》 不著于史，《唐书·地理志》
金州属贡麸金、芽茶……， 金州属贡麸金、芽茶……，
《宋史》则无茶、椒……， 《宋史》则无茶、椒……，
盖昔之所有，或为后之所无， 盖昔之所有，或为后之所无，
不可拘也，今据所有并劝导 不可拘也，今据所有并劝导
所增著于篇。 所增著于篇。

6.本辑收录的茶叶资料，特别是北方和西北省区的物产茶资料，有一部分是非茶类的代用茶，凡编者能确定和认为须注明的，均用“*”标出；但有些南方产茶省区的物产中的“茶”，如“苦茶”、“甜茶”，也有指苦丁、皋芦和其他植物的情况，我们并没有逐一注明，这是要读者在用时注意的。为什么要把部分非茶也作茶收下来呢？因为研究史的角度要宽些，如我们在《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收录的皋芦和苦丁资料，现在就常见利用。

7.本资料一律照原书抄录。唯原书因封建关系抬头、空格和避讳改写的字，改为不抬头、不空格和用原字以外，其他不同和增加之点，一为字体采用现在通行的字体；二是编者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按语或说明，但都用括弧和“编者按”、“编者”等符号和文字与原文相区别。

8.本辑收录的方志近1500种，这些资料实际涵盖和代表的方志总数约在4000多种，至于我们查阅过的方志，其总数就更多一些。

导 言

本辑收录的内容，如序言所说，主要是地方志中的茶叶资料。对于方志，研究史学和地理学的人比较熟悉，对多数茶叶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可能就有些生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在收录的本辑资料之前，有必要将方志的性质和基本情况，方志茶叶资料的特点、价值，以及本辑资料的实际和不足等等，先作些介绍，以供大家了解本辑资料的背景，从而更好地利用和分析这些资料。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序和凡例之后，另外又特意再加这篇导言。

一、方志简介

方志也叫地方志，是我国文化中独有的一宗灿烂财富。方志其名，可上溯到《周礼》，其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是书在讲到“诵训”时，又称诵训工作是“掌道四方，以昭观事”。这里讲到的“方”和“志”，也就是指对四方的记述。据此，有人称方志起源于西周。不过，对上面方志辞源的解说，虽然从者较多，但对方志起源西周说，赞同的就不多了。综合古今学对方志起源的观点，除西周说外，还有始于《越绝书》说、《吴越春秋》说和《华阳国志》说；后者认定起自东汉或东晋。本辑方志，绝大多数是唐宋以后的作品，对于方志究竟起源何时、何书？学术界意见不一，我们也暂置不论；下面重点对隋唐、两宋和明清时方志的发展作些剖析。

我们撇开方志起源，就暂把南北朝以前，统称为我国方志的早期发展阶段；紧随其后的，是隋唐时期。隋朝结束了我国长

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后，特别到了唐朝，由于南北的统一，出现了我国封建中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盛期，地方志的编撰，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如隋炀帝大业年间，曾“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图经、图志的撰刊。“图”指地图；“经”或“志”，是图的文字说明。早期的图经，是以图为主，但后来，从现存的唐朝的图经来看，就慢慢变成为以文字为主了。唐朝统治者对方志也很重视，唐太宗的四子李泰，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就曾命萧德言等编撰了一部皇皇 550 卷《括地志》。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更规定州郡图经要每三年（后改五年）一修，并呈报尚书省职方。据考，唐朝中期编纂的图经，就有山、水、渠、驿、堤、堰、县学、怪异、庙观、古城、祥瑞、歌谣等细目，约略具备了方志的体例和内容。

宋代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赵匡胤从巩固和维护其统治出发，在唐朝三、五年一编图经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宋朝规定编撰图经的周期，较唐朝更为繁密，自然也促进了图经编修的进一步发展。以杭州为例，单南宋现存的书志，就有乾道、淳祐、咸淳三部《临安志》。又从体例和内容上看，如果说唐朝图经还只是粗备方志的类型的话，那末，宋代志书的体例，就达到了封建社会方志体例的完备或成熟时期。以咸淳《临安志》为例，其类目有疆域志、山川志、诏令、御制文、秩官志、寺官志、武备志、风土志、贡赋志、人物志、祠祀志、寺观志、园亭志、冢墓志、纪遗志等。在各“志”之下，又分若干细目，其内容较唐以前偏重地理、略于人文的情况，也有明显改变。所有这些发展，对后世方志的体例、内容，都有明显和深远的影响。再从

志书的名字上看，宋以前方志一般都称图经，宋代图经和志在概念上已无差别，名字也可互称，如陈公亮的《严州图经》，绍兴时的刻本，就改用《新定志》之名。定名上的趋势，是用图经者日益减少，用志的一天天多了起来。元代方志，一承宋制，虽也有不少发展，但时间较短，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终究前不如唐宋、后不及明清重要。

明清是我国封建后期的最后二个王朝，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方志最为发展的鼎盛阶段。先说明代，朱元璋建朝不久，就命魏俊民等，编修了《大明一统志》，来夸耀明朝统一的功绩。朱棣做了皇帝后，也曾“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并且还颁布了“纂修志书的凡例”21条，以冀统一各地编修志书的体例和内容。由于这样，明代编修的方志不仅较唐宋数量要多，其方志体例，也较宋元更为完善。如在明朝撰刊的方志中，不少卷首就配以凡例，类目设置大多分为二级，层次也比较清楚。例嘉靖《鄱陵志》分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等近十类，在各类如地理志之下，又细分为疆域、星野、山川等数目。各地方志虽然有繁有简，但编撰的内容都比较接近。因为方志越来越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去编纂，其在维护封建制度方面也愈来愈起到明显的作用，所以在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各地大兴编志之风，多数州、县一修再修，有的地方在明一代，编纂的方志就当超过十次。如江苏的《常熟县志》，现存的明志就还有弘治、嘉靖、万历33年、45年和崇祯等五部。清代在明的基础上，方志的编修，由兴而达到鼎盛，其无论在修志的规模、成书数量和方志理论的研究上，都远远超轶或高于以前各代。据约略统计，现存的清代志书，差不多在6000种上下，占我国流传下来的旧志的80%左右。本辑方志资料，因茶区主要在江淮以南，比较而言，经济、文化较北方和边缘省分

发达，明以前的志书比例高些，但多数也仍然是清志。清朝留传下来的方志所以较多，除因其时间较近外，与统治阶级的重视、广大文人学士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如清鼎革不久，顺治《卫辉府志》序中就载，河南巡抚贾汉复为编修《河南通志》，就曾通令全省各府县都要编修方志。后来，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他又仿照《河南通志》体例，编修《陕西通志》。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奏请各省参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也都编修通志交翰林院，最后汇为《大清一统志》。康熙准奏下令编修一统志。不久，因“三藩之乱”，编志受阻，至康熙二十二年，国内靖安以后，礼部又檄催天下编纂通志。乾隆八年（1743），《一统志》初次编成，乾隆亲加审阅；嘉庆时，朝廷又颁令续修《一统志》，光绪时，各地又掀起一个编志高潮。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在清朝的方志中，尤以康熙、乾隆、嘉庆和光绪志为多。除省志和府、州、县志外，在清代一些地方，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还编修了不少乡镇志。如江苏的《周庄镇志》、《甫里志》，浙江的《南浔镇志》、《乌青镇志》和天津的《杨柳青小志》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修志之盛。

方志除上面提及的全国性的一统志和区域志（唐《元和郡县志》、隋《区域图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和镇志、乡村志以外，还有一些边镇志（如《四镇三关志》）、关志（如《山海关志》）、土司志（如《白山司志》）、署衙志（如《陕西行都司志》）、书院志（如《东林书院志》）、山志（如《庐山志》）、水志（如《洞庭湖志》）、寺庙志（如《灵隐寺志》）、古迹名胜志（如《君山记》）、杂志（如《武林旧事》）等等，种类很多。另外还应指出，有些志书，名字不像方志，但实际和方志完全是同一类著作。如相当《澧

州志》的《禮紀》，《翼城县志》的《翼乘》，《嵯县志》的《剡錄》，《云南志》的《蠻書》，《饶州府志》的《番郡璣錄》，《山阳县志》的《信今錄》，《永新县志》的《禾川書》，《唐栖志》的《栖里景物略》等等，就都是名字不像方志的方志。

通过上述简介，我们认为大家对本辑所收的资料中，为什么唐以前的书名较多署图经？宋代的志书为什么有的称经有的称志？我国现存的方志为什么以明清特别是清朝居多？明清的方志为什么又大多集中在弘治、嘉靖、万历、康熙、乾隆、嘉庆和光绪这样几个年号，以及在府、州、县志以外，为什么还收有许多其他不属地方或不像方志的方志资料等等问题，也就稍可清楚一些了。

二、方志茶叶资料的特点和价值

我国古代方志，在封建统治者来说，组织编写是为其统治服务的。这一点，在一些方志的序言中，说得很透彻：他们把方志，看作是治理郡国之鉴，或者称之为“资治之书”、“辅治之书”。但是，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只起到极大的积累和保存资料的作用，同时对地方也起到一定的文治教化作用。对此，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指出：“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隆污，于兹系焉”。这就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方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作用。如果进一步要具体到方志茶叶资料的意义，那末，它与一般古籍中的茶史资料，至少也主要有这样几点差别：

一、方志茶叶资料有很强的地区性。众所周知，在我国方志中，为数最多的是县志。所谓县志，也即一县之志，主要记述该县一邑的情况。其次是州志、府志和省志，范围较县志大了些，但实质上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地方志。至于少数全国性的图志和一统志，名之为全国，但其记述的内容，大多和州、府、省志一样，一般也是分县或分地区写的。所以，方志和一般古籍中的茶叶资料的最明显特点，即是其条条资料，都有非常清楚的地理背景。

二、方志茶叶资料有较强的历史性。应该承认，我国古代方志和其他史籍一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沧海桑田，散佚是极其严重的。但是，即便如此，现在绝大多数市县，每邑也总传存有二、三种、五、六种甚至更多的旧志。这说明我国古代方志散失虽多，但编纂的次数更多。事实也是如此，在我国有些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历史上方志一修再修，曾撰刊过不知凡几的志书，虽然大多数散佚了，但现在流传下来的，最多仍有多达十余种的例子。如苏州，从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算起，包括北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卢熊的洪武《苏州府志》，一直到1928年吴昌绶的《吴郡通典备稿》，现存的历代志书，还多达15种之多。由此反映方志的另一特点，是其编纂工作的连续性。因为这样，方志茶叶资料对本地茶业的发生、发展，记述较一般史籍要清楚和具体得多。

三、方志茶叶资料有明显的广泛性和一致性。方志是一种专门记述一地历史和地理的综合性著作，其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廓市镇、物产、贡赋、田地、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绩、人物、仙释、杂志、艺文等20多个类目。因为方志所列栏目较多，所以，其收录的茶叶资料的面也较宽。即

以上录的目录来说，其中除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治、户口、学校、军卫、廨舍和桥梁与茶的关系较少外，其余大多与茶或可能与茶有关。如山川、物产、田地、寺观、祠庙、古迹等志，在讲到地之所出时，会记及茶；坊廓市镇和杂志中的以茶氏名的地名及茶叶贸易情况，会提到茶；风俗、人物和仙释中，常常会提及饮茶、用茶的习惯和高僧、名士嗜茶、尚茶的轶事；贡赋、古迹部分，往往会记及茶引、茶税和历史上贡茶的情况；在名宦和艺文中，每每收录有历代倡导和歌吟茶业、茶事的诗文。如此等等，都足以说明方志收录的茶叶资料的广泛或全面性。这里还要指出，方志茶叶资料虽然广而全面，但不零乱，相对集中在物产、山水、赋税这样几个部分。如查索南方某县方志中是否有茶叶资料？只要首先查一下物产或土产中是否有茶的记载，便可初步确定。如前所说，我国早在唐代的图经中，就已形成初步的方志体例；至明初起，为进一步统一方志体例，在诏令天下修志时，还同时颁发“纂修志书凡例”，要各地参照执行。所以，在绝大多数地方志书中，都设有物产或土产这一类目。在这点上，又显示出方志茶叶资料的某种一致性。

由于上述这些主要特点，方志茶叶资料较之其他史籍和档案茶叶文献记载，也明显具有以下几点独特之处：

（一）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我国茶树资源的分布和我国茶区的历史发展或演变。在我国各地方志中，有些志书对茶的记载，不但在物产中简单提及“有茶”，有的对本地不同茶树品种和山林野生茶树的性状，也有所描述。方志物产中的茶叶记载，是一邑有无或种不种茶的可靠依据，作为“方志茶叶资料专辑”，把全国出产茶的方志资料汇编一起，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我国茶区的西界、北限及其历史扩展和消长变化情况。

(二)方志茶叶资料特别是汇编成书以后,对于了解、编著各地乃至全省、全国茶叶生产或茶业发展历史更加实用和便利。因方志除收录一些修志时的现实情况外,对与本邑有关的重要史籍记述、名人诗文、碑刻等历史文献记载,也多有所考述。所以,一般说,史籍中对某邑的记载,在该邑的志书中都会有反映,而方志中的多数内容,却往往是其他书籍所不见的。因此,从这点上来说,志书在保存地方茶叶史料方面,其价值较之其他书籍为高。不过,由于历史上方志散佚和转辗流传的情况十分严重、复杂,许多方志在本地或本省往往不存,查阅起来反不如某些经、史、子、集方便。现在把全国现存的方志茶叶资料汇编起来后,对各地研究和编写茶叶历史,就无疑要方便一些。

(三)方志茶叶资料较一般史书记载,更翔实也更加可靠。由于方志引录的历史资料,大多是经过考辨的资料;其刊载的现实资料,又全部是当地官吏士绅记述的当时、当地情况,所以从史料价值的角度上说,方志茶叶资料较一般史籍记载,要相对全面、具体和精确得多。举例来说,如浙江湖州长兴县的贡茶情况,其他史籍的记载,往往是唐朝的书籍记述唐朝的情况,明朝的著作,记录明朝的情况,且大多语焉不详。但在清朝嘉庆或光绪《长兴县志》中,就对中唐、五代、北宋初年、元朝和明、清历代贡茶的情况,追溯、记述得十分详尽和清楚。

(四)由于方志茶叶资料有比较明确的时、空概念和具体、详细,它具有其他史籍、报刊、档案资料所不具的独特补证作用。换句话说,也就是方志茶叶资料中,保存有其他各类资料所没有的一些重要茶叶史料。如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有些民主先辈为谋求自强和富国之道,在茶业上也曾

一度出现过一趋赶印度、锡兰的振兴浪潮，除组织各地名茶参加东京、巴拿马等世界博览会外，在国内，农商部为促进改良、竞争，也自办过全国性的博览会。那末，在这段国内外举行的多次博览会上，我国哪些地方有哪些茶叶获得过褒奖呢？对此我们曾查阅了国家第一和第二档案馆的大部茶叶资料，查阅了这一段出版的有关报刊和旧书，所获聊聊。但如果把各地方志中获奖的资料全部辑出，就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这段时间我国各地茶叶获得奖牌的情况。再如历代贡茶的情况，如果不利用方志资料，即使把我国现存的所有书籍细篋一遍，也难以获得全面和系统的印象。如果把方志中的所有贡茶资料辑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另外，史籍中有些史料，特别是有些诗词中提到的地名和茶事内容，如不是方志中有辑录和说明，有的可能永远也搞不清其时间或地点。如《皎然集》和《全唐诗》中，都收有《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一诗，这题中讲到的陆羽“青塘别业”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不是潮州和乌程方志有载，就可能永远是一个历史疑案。

我们上面所说方志茶叶资料的这些特点和价值，是和其他茶叶资料比较而言的，但其也存在古代方志所固有的一些不足或缺点。如其亦不同程度地存在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隐恶扬善的缺陷，以及有些志书存在的以讹传讹和穿凿附会的情况等等。所以，方志茶叶资料不只存在鱼鲁之讹，而且有的还存在张冠李戴和信口开河等弊病。举例说，如《新唐书·陆龟蒙传》中，记称陆龟蒙“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但是，在清朝的有些《长兴县志》中，就变成为“陆羽茶园，在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把陆龟蒙的茶园，讹之为陆羽茶园了。所以，我们上面讲方志茶叶资料的这些特点和价值，但决不是说这部分资料就没有缺点或不足，事